

林风眠离开大陆之后,非常怀念西湖,画了不少西湖画作,无论是谁看了这些画都会感觉仿佛置身于西湖美景之中

林风眠与杭州西湖



林风眠

■龚玉和 文 / 图

林风眠(1900—1991)是20世纪我国最杰出的画家,如果想要寻找一位对现代中国美术最具影响力的画家,那么,非林风眠莫属了。

林风眠1900年秋出生在广东梅州,一座青山绿水的小城。1924年在莱茵宫举办的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上,林风眠结识了中国教育家蔡元培,在蔡元培的推荐下,出任北京国立艺专校长。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成立,林风眠被任命为院长。林风眠对杭州自始至终怀有挥之不去的眷恋之情,在西子湖畔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岁月,并在杭州玉泉留下了一幢小屋,而今已经成为林风眠纪念馆所在地。

出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

1928年,林风眠结缘杭州,出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,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哈同花园大礼堂行就职礼。据1928年4月11日《申报》报道:“西湖国立艺术院于九日举行开学典礼,来宾有吴稚晖等人,行礼如仪后,院长林风眠致辞,略谓西湖有许多人来访,一为游览,二为烧香,前者为此地风景好,自然美吸引,后者为拜佛。其实,佛在人心,何必远道而来,盖亦仰慕西湖之美也,而在美上,人心知足,故有自然之美之外的创造,这是设立艺术院初衷。”艺术院门外,是蔡元培手书的“杭州国立艺术院”校牌。

林风眠以“学术自由,兼容并蓄”为建院方针,以介绍“西洋艺术,整理中国艺术,调和中西艺术,创造时代艺术”为目标。

林风眠聘请艺术院的教师没有门户之见。其时,画系流派甚多,众多教师、画家都有个人独特风格。陶元庆没有留过洋,其艺术个性强,也被林风眠请来,学校的学术自由空气浓厚。林风眠是一位自由主义艺术家,主张自己选择艺术之路。师生中,写实主义与抽象主义争论激烈,林处于“超脱”地位,即不支持这一派,也不贬抑那一派。师生各种流派的展览、刊物都在阐明自己观点,正如《教育大纲》中提出的:“本校艺术教育方针是不偏不倚的立场,在忠于艺术,促进吾国文化恢复其过去的荣光为目的。”

1935年,林风眠靠卖画和“艺专”薪水,在西子湖畔的玉泉建造了一座小屋,房屋由他亲自设计。未料,只过了两年,到了1937年,在“艺专”正在筹备建校十周年校庆之际,日本侵华战争爆发,林风眠宁静的校园生活被打破。11月中旬,日军在金山卫登陆,杭州危在旦夕,学校奉命撤离。

他们撤离后,“艺专”校园立刻成为日军兵营,学校没带走的画作等全被日军用大刀割成七零八落,林风眠的画作《摸索》做了日军盖马厩的防雨布了。日军占领杭州期间,林风眠玉泉的小屋也被用作伤兵医院。

抗战胜利后回到杭州

1945年,抗战胜利后,林风



林风眠画作



蔡元培与林风眠雕像

去了双亲,他像慈父一样为他们在家中主持了结婚仪式。

艺专学生喜欢到林风眠家做客,他们学画、唱歌、演戏,经常三两结伴来到马岭山下,坐在玉泉寺的山门旁或凉亭的石板凳上,聆听从林家客厅里传出来的悠扬音乐,有贝多芬、肖邦、莫扎特、李斯特,有时也聆听令人销魂的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尼莉的歌唱。

1947年冬,马思聪在“艺专”礼堂演出,林风眠陪同妻子、女儿、女婿前来观赏他演奏的《圣母颂》、《西藏音诗》等。结束后,马思聪为答谢东道主的帮忙,在楼外楼餐馆设宴款待林风眠一家与艺专师生。席上,林先生身着一件西式草绿夹克,一顶黑色法兰西小帽,目光深邃,丝毫没有有大画家的架子,用略带广东口音的国语向大家致谢,话不多,却“令人印象至深”。

住在玉泉的这段时间,林先生除了去“艺专”上课,其余时间仍然是画画,题材多为仕女、风景、花卉,还有猫、秋鹭、公鸡、猫头鹰等。

他常常画到深夜,然后摆到地板上。次日早晨起来挑选,满意的留着,多数被撕掉了。他的这个习惯延续了他的一生。林风眠虽使用的是水墨工具,但是不受限制,夹进了水彩色、水粉色,用的画笔除色筋笔外,主要是大号毛笔和各种刷子,他深切地了解到水墨画上用色很难,水墨以墨为主,加进色彩就得与墨协调,这种画法至为不易,所以他作画时非常谨慎。

1950年农历十月初一是林风眠50岁生日,也是他在玉泉小屋内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,他的几位学生与同事过来祝贺,其中有关良、邓白等人。没有过多久,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,稍后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,过左的思潮愈演愈烈,人们把林风眠挂在卧室里从没有公开过的《黑衣女像》拿出来大加批判。1951年初,学校组织了一次批判会,一批师生被冠以“新派画集团”进行批判,有人追根求源,林风眠就成了“形式主义祖师爷”,这也构成了林风眠辞职的直接原因。1951年,风眠辞职离开杭州,这

次一走,再也没有回来。

到上海,独居旧楼27年

林风眠到上海后,一家人住在一位法国朋友的旧楼内,家里生活费由夫人教法语维持。有时,夫人通过法国领馆卖点画作度日,但仍不能维持家庭开销。于是,林风眠给人做家教,收入时断时续。

到了1954年,华东美术家协会成立,主席是刘开渠,副主席是赖少其、丰子恺等人,林风眠是理事。美协可以给点生活费,但是规定画家每月需要拿出一张画交给美协。要画画就要买画纸、颜料等,林风眠家里开销仍旧非常紧张。

1956年,国家允许侨民归国,他的妻子、女儿、女婿离开了上海,远走巴西定居。妻女走了后,林风眠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旧楼中,一住就是27年。

那时,他的绘画不好卖,10元钱都卖不出去,但是,也有“识货”的人,有个人一次买了4幅,跑到美国后,发了一笔小财。

1961年,林风眠玉泉的小屋以7000元人民币的价格被收归国有。

“文革”时,林风眠被关进监狱,罪名是在任杭州“艺专”校长时聘请外国教授,也有“里通外国”的确凿证据,为此在牢狱中整整待了5年。直到1972年,他的弟弟回国探望哥哥,在周总理与廖承志的关心下,林风眠以“无确凿证据,应予释放”的结论结束了牢狱生涯。

1977年10月26日,林风眠离开了奋斗78年的内地抵达香港,住在堂弟林汝祥家中。一见面,林风眠不无感慨地说:“我一生落落,什么家产也没有,只带了40幅画出来。”堂弟笑着说:“不要难过,只要‘画画机器’还在就好了。”

林风眠离开大陆之后,非常怀念西湖,画了不少苏堤、西湖春秋等画作,无论是谁看了这些画都会感觉仿佛置身于西湖美景之中,杨柳由绿转淡墨、远山与拱桥……一派江南明媚清秀的怡人景色。从他的画作中,人们不难窥探到,虽然林风眠晚年寄居异乡,但是,他的心始终不渝地留在西子湖畔,留在了他创作巅峰之所。

一曲《凤求凰》,陶醉了卓文君。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至上的文君姑娘,干脆把自己当作“润笔物”赠送给了司马相如,至今传为千古美谈

稿酬古今趣谈

■陈慈林

稿酬俗称稿费,是图书、报刊等出版机构在发表著作、译稿、图画、照片等作品后付给作者的报酬。传说,我国最早的稿费源于隋朝。《隋书》记载了一个典故:隋文帝杨坚叫手下一个官员起草诏书。另一官员从旁戏说:“笔干了,写不了。”一位叫做郑泽的官员趁机说道:“那就请皇上给点钱,润润笔吧。”从此,古人就把写文章所得的报酬,叫做“润笔”。

文人的水平有高低,文章有好坏,润笔当然不可能都一样。为不同档次文人量身定制的稿酬标准,被称为“润例”。

画家有了名气,都不愿意再轻率为别人白作画,就根据自己画作的尺寸大小、所画内容明码标价,开出个统一价格,叫作“润格”。

说是统一价格,其实也未必尽然。润格还因作者名气、地位而异,还因年代、时尚不同而波动,因此很难“定格”,当然更难“统一”,更多时候是随行就市的“市场价”。

唐朝的稿酬也叫“义取”。这是提醒文人要用正当手段写作取得报酬或利益,内含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的意思。

到了宋代,稿酬叫“惠香”,这是对润笔钱物一种含蓄的说法。惠即惠赠,“香”代指钱物,暗指美意。这也是文人自重身价,标榜自己清高和文雅的一种说法。

明代则把稿费叫作“利市”:意思是买卖所得的正当利润。其实说白了,文人也真没必要标榜清高,写文章换钱,与做生意也没多少本质区别。借用这个词

形容稿酬,自然有取之有道,并包含吉利、喜庆之意。

以上大多是“专业”文人的观念,他们依靠稿酬生存,养家糊口,浪漫不起来。业余文人们则潇洒得多,他们把稿酬叫作“枕头钱”:给多少算多少,把钱挂在枕头上,等会沾酒喝。

更有一些著名作家,创作是为了抒发情感,立德立言。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,呕心沥血,十载苦功、三番删阅,最后不但一分钱稿酬也没得到,还在贫寒交加中冻饿而亡。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少,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作者都没听说拿到过稿酬的。

还有一些骚人墨客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,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和明清小说,同样一分钱稿酬没拿到,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

支付稿酬一般都用现金(金银),但有时也有实物:绛罗绸缎、古玩玉器,直至豪宅等,这些都充当过古代的稿酬,统称为“润笔物”。

碰到特别财大气粗的主(比如皇上),润笔物就是官职。历来文人中,际遇最好、名气最响的当数西汉司马相如,他先是因为写了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,让皇帝很高兴,这官也就一路往上升了。

更有趣的是,因为他的才艺表演给力,还“换”来个妙龄女郎当“润笔物”。某次他应邀到卓王孙家作客,看到靓妹卓文君,现场创作了一曲《凤求凰》,就把卓文君陶醉了。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至上的文君姑娘,干脆把自己当作“润笔物”赠送给司马相如,至今传为千古美谈。

今天,当我们述及现代一批大师级学人,如陈寅恪、梁漱溟、俞平伯等人的时候,都会感叹他们的家学渊源

话说家风



■陈大新

孔子曾对儿子孔鲤说:“不学诗无以言,不学礼无以立。”这就是著名的“鲤庭承训”。后来,孔氏子孙便以“诗礼传家”作为自己的家学风范;

屈原《离骚》开口便道:“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。”而后又提到自己名字的来历:“皇览揆余初度兮,肇锡余以嘉名。名余曰正则兮,字余曰灵均。”“正则”就是公正而有法则。突出了屈原风骨的渊源、高洁正直的家风。

孔子、屈原生活的时代距今都2000多年了,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,家风文化绵绵不绝。

三国时诸葛亮的《家训》可以说家喻户晓,至今,他的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”仍高悬于各种办公场所和私人书房;明代朱柏庐《治家格言》一句“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”仍为人们耳熟能详;清代曾文正公的家书,更曾经是多少政经人物案头之书;家风文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依然浓厚,以致《傅雷家书》成为一时的畅销书籍。

今天,当我们述及现代一批大师级学人,如陈寅恪、梁漱溟、俞平伯等人的时候,都会感叹他们的家学渊源。除了他们自身超于常人的努力之外,得益于他们秉持的家训,承传的家风。家学渊源,成就了他们自由之思想,独立之精神,使他们能够在学界独树一帜,甚至引领风气。

除了有形的家训、家规,家风更有无形的默化作用,后辈通过亲沐其风,心心相印,自觉传承。哈耶克谈道:“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,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,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。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。”

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陆昕所著《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》一书中说,陆宗达(1905—1988,训诂学家,师从黄侃)为人重师恩,不表功,学术上讲包容,讨厌门户之争。这些都是陆宗达的行为方式,并没有系统地论述流传下来,但对陆昕而言,这却是实实在在的“家风”。

民国才女张充和口述《张家旧事》中

谈到她父亲张吉友非常和蔼,爱读书,痛恨赌博,她说:“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,连家里的佣人、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。”这些耳濡目染传承之下的家风,影响力是不在有文字的《家训》、《家规》之下的。家长们的行为方式有时是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。

在整个社会转型之际,家风、家训在当代教育中的缺失令人忧心。毛泽东说过: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。”这个精神就是价值观。大到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,小到一个家庭、一个公民,没有明晰坚定的价值观,是无以自立、自强的。2012年11月,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:“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,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,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”价值观的引领与深厚的中华文化再培育,成为中国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和有力支撑。

当国家对“唯GDP”的观念说“不”的时候,重发展轻文化的观念是到了非扭转不可的地步了。王尧教授在调研古村落保护情况后,谈到“把农民赶上楼”现象:以简单的“推土机方式”铲去的是中国的“乡愁”。过不多久,原先村落中那许多历史记忆、生活习俗、民间文化都将荡然无存,传统文化的根脉将被切断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出来的,是有中国特色的,是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华的,是植根于东方这一片热土之中的。重视文化建设,就是要精心培育核心价值观,使良好家风的生长有更好的环境和条件。

孟子曾细论过五种教育方式,原话是:“君子所以教者五:有如时雨化之者,有成德者,有达才者,有答问者,有私淑艾者。此五者,君子之所以教也。”可以看出,孟子主张的仍然是育人为主,主要手段是“时雨化之”。成德排在达才之前。我们还注意到第五种方式“私淑艾者”,意思是风范被私人私自学习,影响后人,而家风几近于“私淑艾者”。

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,家庭的健康与否,势必作用于社会,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。家风的重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,持之以恒,才能形成健康美好的家风、社风和民族风。